

10.02

邵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邳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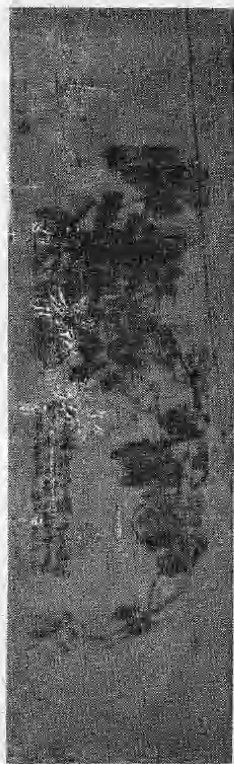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月

YH/42/04



國畫選登

馮夢白作



郭昌同作



林秀华书

书画选登

邳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6年10月

目 录

艺 文 掇 英

- 邳县京剧团史略……………高子亮(13)
黄奋基和他的《晚香堂诗草》……………戴启汉(22)
邳县最早的电影场……………徐一鸣(27)
“棋村”……………臧公瑚·房蓆德(29)

人 物 春 秋

- 顾视哲先生传略……………李德昆(33)
仕途乖舛,不失廉正……………刘学松(36)
——王鸣球事略

清武功将军张旺·····	刘学忠·刘学继 (40)
寄志丹青为人民·····	李子秋 (42)
——介绍美术教师王明泉	
作家程树榛简介·····	朱廷香 (46)
附录：悠悠故乡情 (散文)	
一片冰心在玉壶·····	周伯之·冯超 (52)
——访王山天主堂修女周永义	

革命回忆录

护送陈毅同志去湖西转延安·····	程同谟 (54)
血染武水·····	孟庆柏·汤方闾 (58)
武工队长魏思民二三事·····	张迪珺·魏思成 (62)
张振怀同志革命活动片断·····	孟庆柏·汤方闾 (67)
抗战歌谣选登 (四首)·····	徐一鸣、徐立搜集 (71)
回忆皋堂乡针线会·····	宋振西 (76)
解放战争初期我县党政机关和地方	
武装北撤经过·····	孟庆平 (78)
邳县兵站工作记略·····	孟庆平 (84)
回忆“青救团”·····	戴亮霞 (87)

教育史料

土小校史拾粹·····	土小编志组 (91)
-------------	------------

历史回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在邳县的活动片断

-王仙舟(1)
- 抗战前的邳县监狱.....徐一鸣(99)
- 汉奸匪首刘洪江覆灭记.....冯毅(102)
- 张里元“阅兵”.....梁隆辉(104)
- 县长张德焱被烧真相.....孟庆平(108)
- 中国国民党邳县党务沿革概况.....冯治搜集(110)
- 邳县历任县长人事更迭.....邳县档案馆(111)

革命英烈

- 娄梦侠烈士生平.....李清溪(118)
- 孙文源等三位烈士简介.....曹树桐(122)

文史古今

- 脩石墓器知洪荒.....陈永清(126)
- 从出土文物看邳县远古史
- 邳县粮食生产溯源.....刘廷忠(131)
- 呦鹿山名的来历.....孟庆柏(133)
- “小萝卜头”宋振中烈士塑像在铁富乡中心
- 幼儿园落成.....王守荣(134)

园 林 · 古 迹

名园奇葩今逢春……………石启贞·房蔚德(136)

——石家花园简介

“活化石”八十里……………陈勇进(138)

邳县雪松之王……………张格泉(141)

土山马迹亭兴毁始末……………孙荣官(143)

窦氏门楼……………陈遵孝(144)

补白:

清代邳县邮政局(所)的分布……………(12)

“清真”二字的来历……………(21)

《徐州六千年文化集萃》出版发行……………(66)

苏北鲁南一中心……………(147)

秤……………(39)

邳县名产中药材——半夏……………(145)

华东地区最大的石膏矿……………(86)

邳县名特优产品……………(83)

纺线织布供应军需……………(146)

一次士绅座谈会……………(109)

稿约……………(148)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国民党在邳县的活动片断

王
仙
舟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國民主革命，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倍遭挫折，直到二十年代仍然困难重重。为了胜利前进，深感对组织有改组的必要。适于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改组国民党的无私建议，孙先生欣然接受决定进行去恶留良，并吸收新鲜血液的改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在广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组织，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从而建立了国共两党革命的统一战线。

大会闭幕后，孙先生指派朱季恂回江苏建立新的组织，是年五月，成立临时省党部于淞江。次年八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九人，为：柳亚子、侯绍裘、朱季恂、张曙时、刘重民、黄竞西、戴盆天、宛希俨、张应春。

当时的邳县，倍遭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及地主豪强敲骨吸髓的压榨，复以连年水灾频仍，天灾人祸交相煎迫，民生疾苦到了极点。人民要求解救倒悬之心，万分迫切，对孙先

生决心改组国民党、树起反帝反封建大旗的义举，竭诚欢迎。一九二五年八月，江苏省党部委员张曙时、侯绍裘派冯克操①秘密返回邳县，传达省党部在邳县发展组织的指示。第一高等小学教员解慕唐、王仙舟、戴蔚霞及社会青年焦梦白等首先响应号召，参加组织，并成立了临时区分部，解慕唐被接纳为委员。经过一年多的积极活动，又发展五十多人接受新三民主义，参加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其中有进步青年，也有早期参加过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前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冯克操二次回邳，在邳城成立了邳县县党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七人，进行推翻北洋军阀与打倒土豪劣绅的秘密活动。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广大群众受到莫大鼓舞，我们也进一步加紧活动，除积极宣传、发展组织外，还千方百计缝制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新国旗，准备北伐军到达时悬挂。旗的式样与尺寸均按省党部的规定。图形比较复杂，不易缝制，我们先与贫儿教养院石印所的一位工人秘密联系，取得同意后，把右上方青天白日部分用石印印制，然后又与三德缝纫公司秘密联系，缝制成旗，共三十幅。并印制青天白日袖章九十幅，备作公开活动时作为党员的标记。夜间，把制成的国旗与袖章用瓦缸埋在三德公司后院邹允贤家的花坛下。

年底，北伐军克复了武汉三镇，北洋军阀因军事失利，狗急跳墙，对统治区人民更加凶恶，邳县社会上随之更加黑暗混乱。敌人为了封锁失败消息，所有外埠寄邳的报纸均被扣留，因之外地的消息全部隔绝。同时陇海、津浦两路全搞

军运，人民的往来陷入停顿。我们耳目闭塞了，对时局难以了解；同时军队拉伕，土匪蜂起，几乎断路行人，也无法多派人外出打听消息，这使我们无异居于鼓中。五月起，见到社会秩序特别紊乱，军事调动十分频繁，估计北伐军临近了，我们一方面多方设法打听军事情况，同时日夜守候消息，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达。六月十七日，接到从南路送来的消息，得知北伐军沿运河北上的先头部队已到窑湾，大榆树敌军有撤退模样。我们随即举行紧急会议，布置迎接事宜。次日上午，正在工作紧张的时候，在县政府工作的邹允贤派人送来了火急消息：县警备大队长高黑子请示县长，要求逮捕“乱党”解慕唐、王仙舟，防止县城发生骚乱。我们两人立即安排好工作，约定联系办法后，绕道后街，从北门出了城，潜去依宿。傍晚得知北伐军已从大榆树北进，乃趁夜返回县城，沿途遇到不少孙传芳部的败兵。进城后，知道北伐军已经到达，当即到团部驻地，见了政治部主任表示欢迎之意，并报告了地方情况。当夜，我们挖出了窖藏的国旗及袖章。第二天早上，在三个城门及各单位升起了新的国旗。八时，召集城乡居民在体育场举行欢迎大会，情况十分热烈。散会后，大家列队在城关内外游行，高呼：“欢迎北伐军！”，“拥护中国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并在西关内关帝庙设立县党部，公开活动。

不料，一帮过去在地方作威作福的士绅权贵、商业巨头及其“军师”走卒等，不愿失去他们的“天堂”，一个个自封为国民党员，在东门里一个寓所也设了所谓“县党部”，并且纠集了一伙衙役流氓到街上游行，学着喊一些口号，可

是唯独不喊“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虽然一再向政治部陈明情况，但始终不曾作出明确表态，只是对他们不作联系，置之不理而已。社会上称我们的办公地点为“西党部”，称他们的巢穴为“东党部”，一时鱼目混珠，真假难辨。

正当我们准备动员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并解决这个所谓“东党部”的败类团伙时，革命形势却突然逆转，东路先遣游击司令李明扬领导下的孙伯文部，从临沂撤回。接着，驻邳城的北伐军也通知我们南撤。我们因已公开活动，身份暴露，除留下部分同志转入地下活动外，其余四十人随军撤走。这时“东党部”的那帮败类的反动面目已彻底暴露：他们站在街道两旁对我们撤走的人肆意讥笑，并无耻地叫嚷：

“快点跑啊，台庄军队要来送你们啦。”实际上他们已经派人前去台庄迎接孙传芳部队了，在事实面前，分清了真假革命。

我们离开县城的当天晚上，住在大榆树对面的冯家，次晨与解慕唐、黄悦之、焦梦白等同到火车站站长家里，见了北伐军东路指挥部总司令白崇禧。我们向白报告了当地情况。他要我们做两件事：一是从速画一幅从邳县向台儿庄进军的简明路线图；二是提出邳县临时县长及公安局长的 人 选。返回住处后，我们立即安排人草绘出地图，并磋商出县长和公安局长人选，及时送给了白崇禧。他立即委任王化云为县长，王兰田为公安局长。王化云任县长是他自己争取的。王兰田任局长是大家推举的，因为他有些军事知识，从县城撤出时，就是由他指挥一部分武装为我们断后的。

二十八日黎明，接到北伐军继续南撤的通知，我们也随

着撤走，自窑湾搭船经淮阴、扬州、镇江，于八月七日到达南京。

在南撤的路上，虽然吃了些苦，但大家情绪并不坏。因部队的撤退并非战败，而是有计划的后撤，对革命仍怀有坚定的信心，只是对为什么不战而退，迷惑不解。

到南京后，才知道大革命失败了。尤其是领导我们的江苏省党部，已被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解散，侯绍裘也于四月十五日在南京被蒋介石指使暴徒杀害。张曙时也遭逮捕，幸在押解途中挣脱逃出虎口^②。这不啻是晴天霹雳，使我们悲痛万分。在离县前，我们就长期看不到报纸，对大局形势不了解。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也一无所知，一时听到这种消息，怎不让人痛心疾首呢？！次日，黄锐之、刘举之、焦梦白、解慕唐、戴蔚霞等人到广艺街冯少瞻家中磋商应变问题。开始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不愿开口。沉默一会后，冯少瞻说：“不要这样紧张，没有必要。我过去不曾回县，大家闷在乡里，我在外边知道的情况比较多些，也有机会同各方面联系，我们的处境不象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被动，大家安心好了。”他又说：“形势的变化确实很大，眼下同四月份以前相比，简直是黑白颠倒，是非倒置了。侯绍裘、张曙时两同志的遭遇很惨重，我们很难过。不过就革命者来说，这也是平常的事。不能因为有的同志牺牲或遭迫害，便灰心丧气，裹足不前，应该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冷静，不要惊慌。同时，还要认清形势，继续前进。再者，这不是我们一个县的问题，还有不少县或多或少地有同样的情况。尤其江南沪宁线两侧，更为严重，有不少同志

也遭到迫害。不过，也要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苏北各县，特别是徐海地区的情况，错综复杂，一时理不清，现在的省党部对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也不十分清楚，更没有惊慌的必要。在你们到宁以前，我已同顾子扬说了，他也是现在省党部的委员。我对他说，我们县的组织关系一直受你的领导，以后还要继续靠你领导。他很乐意，并且也这样向省党部作了汇报。顾的为人不错，在徐海的名声不坏，对革命做了不少事。他对侯、张两位同志的关系一直很好，同时我们这样做对他也有好处。我看他不会与我们为难的。”

“另外，关于我县内部今后由谁来领导，我看现在不要考虑，不管今后省党部点谁出来领导，都一样，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了。最要紧的，我们要仍然按照以往的精神继续干下去。现在不要多谈这个问题，谈了也没有什么实现意义。当前南京的整个形势，还正在与孙传芳隔江对峙着，主要是在打仗，一时还谈不到这样的小问题，请你们先安下心来休息休息好了。”

关于大家的生活问题，也听顾（子扬）说了，“省党部正在考虑。这是江北各县党员共同的问题，都是匆匆动身没有准备，不曾带出来较多的钱，需要有安排。很可能不久即有接济的决定，不要焦虑。有哪位眼下就有困难的，我可以先帮助解决。”经过这样一番谈话，大家都同意了冯的意见。虽然各人心里不无顾虑，但也提不出别的办法。果然，省党部很快发给每人每月生活津贴八元。数目虽然不多，但大家节约着用也能够果腹，同时又安排我们到大沧园的一所中学里住宿。

天气转凉以后，我因为以前在南京读书，社会关系多些，陆续筹措了一些钱，还有其他同志也借到了钱，大家分着添置了御寒衣物，没有挨冷受冻。

虽然生活能够安然度过，但在精神上却如油煎火燎，度日如年。经过龙潭一役大胜之后，孙传芳渡江部队全部被消灭，南京得到稳定，同时反动的“宁汉合流”得到实现，蒋介石乘胜进行二次北伐。我们因为实在蹲不下去了，也乘机，由我与解慕唐、邹维汉、韩标四人先行北返，十二月底回到邳县城。当时的敌军，还守着离邳城不远的台儿庄，城厢的秩序仍很紊乱，回乡土匪更加横行，烽火连天，烧杀抢劫，时有所闻。我们又在关帝庙内设置了办公处，白天公开活动，但在夜里，为了防备“东党部”那伙败类及其他敌对分子的暗算，还要秘密住到安全的地方去。这次北伐军自十二月十六日克复徐州之后，便暂时停止不进，邳县也乘机由北伐军文鸿恩师的文朝籍团为主力，进行剿灭土匪，地方秩序逐步有了好转。

从一九二八年初开始，所有年前随军南撤和转入地下的同志，以及前年去武汉参加革命的同志，陆续回到了县城，革命声势大大加强。为了妇女运动的迅速开展，特邀从武汉回来的徐丽芳，参加县党部工作，并兼县妇女会长。

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则在打土豪劣绅。全县的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所占有，他们凭借土地的占有权，胡作非为，罪恶滔天；除强收高租，放高利贷、残酷剥削人民外，还肆无忌惮地使用武装，抢劫绑架群众，使不少人遭受家破人亡的惨祸。当时所有大地主无不购置武器，名为自卫，实则不少

人用以抢劫。有的是一家单独作案，有的是多家结伙犯罪。他们还相互勾结起来，挟制官府，左右县政，县长如有违背，便加以危害。如一九二〇年县长张德霖就是因为未能完全听从他们的摆布，被这伙恶霸加以谋害的。全家被炸死于县政府的花厅里，烧得尸骨无存。因此，我们认为，不尽快除掉这批土劣，消灭社会的罪恶根源，不足以与民更始。

怎样惩治他们呢？开始酝酿时，有两种意见：以解慕唐、朱元培为首的，我们一批年青同志，主张动员农民直接惩办土劣。理由是，三大政策明明有“扶助农工”的规定，动员农民起来解决自己的苦难，最为正当；用“耕者有其田”的道理，号召他们起来则轻而易举。试想他们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有人加以援助，解救出于水火的时候，他们焉有不踊跃奋起，誓死斗争的道理呢？虽然地主，特别是土劣拥有大量武器，但是土劣本身，在人数上微不足道，自己使用不了很多武器，多数枪支还掌握在由他们雇用的穷人手里。这些穷人一旦觉醒过来，不会为地主卖命的。另外，年岁比较大的一些人如王兰田等则提醒说：局势变了，不是北伐开始时的情况，蒋介石早已公开反共，不允许农民直接打土劣了，这样的想法做不通。应该走所谓“合法”的路子，就是自上而下的制裁土劣，江苏省已经设立了专为惩办土劣的“特别法庭”，庭长是我们徐州的刘汉川先生，这样做比较合适。经过几天的反复讨论，最后意见统一了，采用后一种办法，走“合法”的路子。并且派人去南京问刘汉川先生，“特别法庭”是否真的惩办土劣？他说：“当然要办，不然设它干什么？”因此，我们就信以为真，先将民愤

极大，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及仗势欺人、高利盘剥群众的一些家伙加以逮捕。一时革命形势大振，其他土劣闻风丧胆，四出逃窜。同时我们还提出对地主按土地数量，实行累进率征收捐款，作为创办农民银行基金，将以无息贷给农民。当然这不是扶助农民的根本办法，只是在革命低潮时，不得已的权宜措施。

这时候，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革命伪装，步步自我剥脱下来。江苏省党部的态度随之作了急剧的后退。原来为了惩办土劣而设的“特别法庭”，只隔两个月便改变口风，对土劣不惩办，只关一个时期。就是说改为只关（押）不办（惩办）了。这使我们大失所望，陷于尴尬境地。又经过不长时间，情况变得更糟，他们竟然滑到是非倒置的地步，从惩办土劣到保护土劣，把原告改为被告，开释了土劣，逮捕了原来逮捕土劣的人，在我们邳县也是如此。比如公安局长王兰田就被土豪劣绅反诬为共产党而锒铛入狱。关于创办农民银行的倡议，不啻与虎谋皮，当然也被搁置起来，无法进行了。至此，打倒土劣扶植农民的计划一筹莫展，革新地方的愿望也成了泡影。

正在徬徨的时候，秘密时期省党部左派委员张曙时（这时已是共产党员），参加南昌起义后，秘密转回上海，领导地下反蒋革命斗争，此时为我们送来了消息，说：“从大局说，蒋介石发动二次北伐进军之后，北洋军阀必然败北，反动统治也必然加强，不过邳县毗邻山东，处于原蒋管区的边缘，较为特殊，如能运用得宜，国共合作的局面，还有可能保持一段时间，对革命也可以多做点事”。这些话，给我们